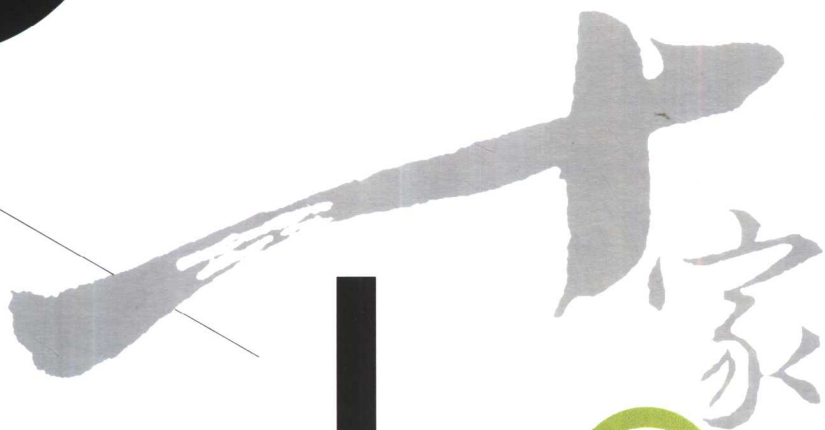


蔡尚思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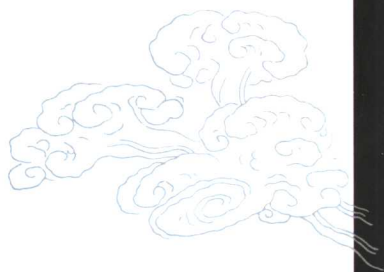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

墨



蔡尚思

主编

十家

论

墨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家论墨/蔡尚思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4372-8

I. 十... II. 蔡... III. 墨子—研究 IV. 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235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十家论墨

蔡尚思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50,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372-8/K·982

定价 25.00 元

《十家论墨》编辑小组

主 编 蔡尚思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华 铮 汪逸珮 戚 文

编辑小组 方婉婉 朱荣琴 华贻芳 邵申元

陈宁宁 张书栋 顾眉君 钱宝谨

屠玮涓 戚 瑛 谢惠廉

《十家论墨》序

胡德平

蔡尚思、戚文、汪逸珮、华铮诸君选辑近、现代墨学研究者梁启超、王桐龄、伍非百、方授楚、郭沫若、杜国庠、严灵峰、詹剑峰、蔡尚思、任继愈十人关于墨子研究的论著，汇为《十家论墨》，献于世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社会至今仍然在尊孔，历代帝王将相则不可不知韩非子，生活悠闲的士大夫大多喜欢老子和庄子。其实，墨子才是一位最不应该被今天的劳动大众和企业家人所遗忘的卓越人物。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最先分离出独立的手工业者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严格地讲，墨子是小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的代表。墨子的哲学以“利”为指导原则，“利”又被他认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他也常谈“义”，区分“义”与“不义”的标准则以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而为判断根据。墨子的伦理观是“兼相爱，交相利”，其可称道而又可贵之处在于：

其一，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同义语，又可互为引申，相互补充，两者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爱要以利为基础，利要以爱为归宿。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的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其二，墨子提倡的“爱”，超越孔子君臣、父子、庶人、大夫的等级界限。墨子提倡的“利”，又是同一时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后来的耶稣基督思想中所稀有的。可以说墨子这一人道主义思想

最少统治阶级的烙印,而又最能反映劳苦大众的利益。

其三,“兼相爱”的“兼”、“交相利”的“交”,两者互为主体,又均为客体,不分上下,不分左右,不分高低,不分内外。即所谓“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意思就是要想真正得到长久的利益,必然是互利互惠之交,利人利己之爱。这一见识大大高过亚当·斯密的以自利而达到互利效益的西方观念。

其四,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基础,此即“尚同”。这是对事物是矛盾统一体的认识,其影响甚为巨大深远,战国后期的儒家接过了“尚同”的命题,改变了孔子学说中的“和而不同”的主张,从而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大同”和“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其号召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永恒的魅力。

其五,墨家不仅在口头上宣扬他们的观念,而且在实践上也艰苦力行,摩顶放踵地追寻他们的理想。墨子主张“非攻”,历史上留有“墨子救宋”的美谈。墨子主张“节用”,他亲操劳作,“以裘褐为衣,以跣踣服”。墨子主张“交相利”,他仗义执言:“有力者疾以助人”,反对“舍余力不以相劳”。总之,凡“兼爱”、“利义”之事若遇艰危,墨家均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实践其学说。

从墨子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当中国社会产生出最早的独立手工业者以来,他们第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多么丰富、深刻而又意趣宏远,这是东方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辉遗产。我希望《十家论墨》的出版,能为墨子研究开展一个新局面,以有助于人们从中国古代这一优秀文化遗产中吸收有益于现代的东西。

《十家论墨》要点

蔡尚思

我就《十家论墨》专著,指出一些要点,以供读者参考。

一、梁启超著《墨子学案》

梁启超(1873—1929年),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被称为国学大师。对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宗教等方面均有研究。

梁启超是清末举人,从学于康有为,创办和主撰《万国公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十种以上的报刊。他主张中西学结合,编辑《西政丛书》。主持时务学堂讲习。力请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为光绪破格召见,授六品官衔,奉命主持译书局事务。后与康有为共同领导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走日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而用以治中国史。入民国,历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先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动。1918年后,从政治舞台转到教育与学术舞台。他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南开大学、东南大学的聘请,讲授中国学术思想。1925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

梁启超的著作很多,已有《饮冰室合集》,实还不全。其代表作有《新民说》、《自由书》、《欧游心影录》(1919)、《清代学术概论》(1920)、《墨子学案》(1921)、《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先秦政治

思想史》(1922)、《国学入门书及其读法》(192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专著与《墨子学说》(《墨学微》)(1901)、《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等论文。

中国近代被学术界公认为“国学大师”的有章太炎、王国维与梁启超三人,就学术方面来对比,章太炎的学术成就在其前期,而最长的是文字学。梁启超的学术成就在其后期,而最长的是史学。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则较专精(甲骨文),梁启超的学术成就较广博。单就文章而论,章太炎学魏晋,很艰涩;王国维学两汉,很简朴。梁启超自称为新民体,最流畅生动,最富有感情,其文言文比较接近于白话。章、王两人均不写白话文,梁则兼长。这几点研究中国文学史者,似应注意到的。

在学术上,梁启超比章太炎、王国维两人,能开风气之先,其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年,梁启超“文名满天下”,被誉为“舆论界的骄子”。“学问文章为天下之冠”(《梁启超著述系年》)。但其政治思想却与学术相反,以致被评为“学术上的巨匠,政治上的侏儒,就是这位资产阶级学者和改良主义政治家矛盾而统一的形象。”(《梁启超著述系年》)

梁启超在墨子的研究上,也是前期与后期相反:他在前期尊墨反孔,自号与文章署名均来自《墨子》,如任公、任庵、任甫、任父、任、兼士等;到后期又反过来而尊孔反墨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崇拜墨子者。他在《墨子学说》一开始就称墨子独能救中国:“今举中国皆杨也……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墨学。”在他处也说:“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痛则何以哉!”

梁启超也是采用新式即西洋式的治学方法来治墨学的第一人,使中国古来治墨学者的风气为之一变,其功实不可没。诚如严灵峰所言,中国古来的治墨学者“大都偏于训诂、校勘,于墨子思想作系统之研究者,殊不多觐,诚美中不足者也。清末新会梁启超所

著《墨学微》一书泛论墨子学说，蹊径独辟，别开生面，为墨学创历史之新页”（《墨子简编》）。

梁启超的论墨子有正确的一方面。

如他指出的孔、墨两人思想的不同：“孔子并没有从新改革的觉悟，不过欲救末流之弊，恢复原有的好处。墨子生孔子之后……不像孔子那种中庸性格，他觉得旧社会整个要不得，非从根本推翻不可。所以他所提倡几条大主义，条条都是反抗潮流，纯带极端革命的色彩。革新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墨子特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墨子学案》第一章二）

如说：非命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为有益。……墨子大声疾呼排斥它，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墨子学案》，第四章）

如说：“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墨子学案》，第六章）

如说：“诸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墨子》一书，盛水不漏者也。纲领条目相一贯，而无或牴牾者也。……”“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墨子学说》附《墨子论理学》）

同时，也有错误的一方面。

如梁先生在《墨子学案》书中说：“墨子的兼爱的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第二章）

如说：孔墨“两圣人的经济学说，同归宿到这一点”（《墨子学案》，第三章）。

如说：墨子学说最大的缺点，莫如“非乐”。

如说：墨子“不免干涉思想自由太过，远不如孔子讲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了”（《墨子学案》，第五章）。这是他忘记了孔子也反对争鸣（如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习）乎异端，斯害也

已”)，才会说出这种话。

如在《墨子学说》书中说：“墨子于九流之中较为晚出”。晚出在儒道法三家之后么？这也有问题。

甚至说：“鄙人笃信鬼”，“鬼学(魂学)至今已渐成为一系统之科学。……畴昔所指为神通为不可思议者，今皆有原理之可寻。……而佛说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奥理，至是乃实现而入教科矣”。这话表明，梁启超终于成为有神论的代表了，这是可惋惜的。

二、王桐龄著《儒墨之异同》

王桐龄(1878—卒年不详)，历史学家。河北任丘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师。著有《中国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等书。

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一书，对儒墨两家的异同，分为宗教、道德、政治、模范人物、圣经贤传、教义之实行等六章，其结论罗列为六十七点，不免带些枝叶问题。他指出的异点都正确，同点却未必然。

儒家虽崇拜“六经”，“六经”却不等于儒家，他用“六经”证明儒家学说，不甚妥当。

他定陶潜为儒家，亦不合事实。陶潜实较近于道家。

他以汉后佛教、明后耶稣教传入中国与墨子之兼爱主义的复活混为一谈，也不免误会。

但此书中却有很多新见解。如他用唐、元许多小说“以证明墨学虽中绝，而墨学之理想犹潜藏隐伏于后人脑筋中，固未尝完全消灭”。用明清忠臣义士组织秘密结社，证明墨学的流传，凡此都是此书的特识。

三、伍非百著《墨子大义述》

伍非百(1890—1965年),哲学家、逻辑史家。四川蓬安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历任四川大学、四川国学院教授。创办西山书院、川北文学院。解放后,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文史馆研究员。著有《中国古名家言》、《墨子大义述》等书。王元德在序中称此书:“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不言,洵自墨子以来,一大创作也。”并非过誉。

此书对于兼爱、非攻、非乐、尚同等均有创见,而在结论中用墨子之言与《礼运》的大同说进行对照,非常简明,尤为他人考辨所不及。

伍非百认为墨子之学,所谓天志、明鬼诸目“皆非本也”;“其本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亦言之成理。

但此书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从此书中可以看出伍氏实是尊墨反孔的代表人物,但他却声明:“谈墨家者每喜轻儒家,因而非孔,此大失古义。孔、墨同出一源,墨子有取于孔,乃系史实。故于篇首述墨子时提及学术渊源,以明孔墨之关系。结论于儒墨不同之点,及儒家末流之弊,亦颇指出,非敢有诬先圣也。”这就未免前后自相冲突。他又说:墨子“远祖夏禹,近取仲尼,而倡兼爱尚俭之说”。说墨子“远祖夏禹”,尚合史实;说墨子“近取仲尼”,却大错了。墨子力倡兼爱而反孔子的别爱,连道家的庄子也看到孔子重孝,而说:“至仁无亲”,“孝固不足以言之”。法家的韩非也看到墨子主节用、节葬等而反孔子的奢侈厚葬,因而以孔、墨二人为奢俭相反的代表。伍氏有时以“大同”为墨子之说,有时又相反地说“儒家之大同”与墨子之“爱人必待周,皆兼爱也”,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是将孔、墨混为一谈了!

四、方授楚著《墨学源流》

方授楚，生卒年不详，有关学者专家传略的辞书，均未见“方授楚”的条文。从其所著《墨学源流》自序中看，他先后读过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曹耀湘、孙诒让、胡适诸家述墨学的著作，认为于墨学皆有所见，有所明，而不免有三蔽，皆由尊墨太过，以致发生两种反响。方氏在湖南教学，研究诸子，广为搜讨，粗有撰述，而未完成。1928年任教上海，当时胡怀琛、卫聚贤二人著文说墨子非中国人，方氏先后草论多篇，驳其臆说。他以上述诸人于墨学有所蔽而发愤著此书，时在1936年。

方授楚所著《墨学源流》，在近现代墨学著述中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内容也很丰富。

他肯定地说：“墨子之学说，固陈义圆满，而其人格之伟大崇高，及所以救世之急者，不独在二千年之中国史中无其俦匹，即求之世界史中，亦不一二觐也。”

他认为墨子“其思想之特点安在？一言以蔽之，则平等是已”。

他指出惠施、孔子的“泛爱”，均非墨子的“兼爱”之认真可信！

他对郭沫若以墨子为反革命派评论道：“此似以消灭为其罪恶，乃落井下石之论也。认为反革命，则于墨学之真相已有所误会，其消灭与否乃适不适，而非尽由善不善。”他的敢于争鸣精神很难得！

他独指出“儒者受墨家影响之深，非可尽指，尤以《易传》之《文言》、《礼记》之《大学》与《礼运》大同之说，最为彰显。……孰谓墨子、禽滑釐诸人之学，一朝而斩焉以尽，渐焉以亡也耶！”

他认为墨学衰微灭亡的原因有四个：

一是由于“自身之矛盾”。这一点似不能成为理由，先秦各家中自身的矛盾最多的是儒家，何以它不会衰微消灭呢？此点另详

于拙著《论语导读》，这里无法举例了。

二是由于“理想之过高”。我觉得此与他在下文所说“墨学之复兴”，也有些矛盾。

三是由于“组织之破坏”。

四是由于“拥秦之嫌疑”。

他又说：“凡此所述四端，皆由墨学本身之缺点，而外界之反对不与也。”其实，墨学的衰微，主要原因恰恰在“外界之反对”，尤其汉武帝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王朝一直在严禁墨学。而墨家思想并未灭亡，只好转入地下，存在于民间，以与王朝对抗。

此书 1937 年初版本分为两卷，上卷为“墨子的生平及其学派”，分为十章，论述墨子生平学说，传授、衰微等；下卷是“墨子之姓氏国籍学说辩”，分为四章，批驳近世之“墨子是印度人说”、“墨子是阿拉伯人说”。

五、郭沫若著《墨子的思想》 《墨家节葬不非殉》

郭沫若(1892—1978 年)，政治家、文艺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四川乐山人。原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习医学，后从事新诗创作。并与人组织创造社，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救亡运动，发起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历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全国文联主席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等职。重要著作：学术方面，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奴隶制时代》、《十批判

书》、《青铜时代》、《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石鼓文研究》等。文艺方面,有新诗《女神》、戏剧《屈原》等。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郭沫若在孔、墨两家比较问题上,最突出的就是尊孔反墨。他在此方面著有《孔墨的批判》、《墨子的思想》、《墨家节葬不非殉》等。

为了保存文献,以利于百家争鸣,本编特选郭沫若反墨作品,《墨子的思想》、《墨家节葬不非殉》作为一家之言之代表作。

郭沫若在前一作品一开头就断定“墨子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他先声明:他“不是袒护儒家”,要请朋友们“平心静气地来研究研究”。其实,通观郭沫若有关孔墨二家对比的著作,不难发觉正是由于他自己的“袒护儒家”与未“平心静气地来研究”问题才会得出墨子“带有反动性”的结论。连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钱穆也能看出孔、墨二人阶级(贵族与平民)、生活、动作、言论,完全相反。历史学家是不是也要有些历史主义呢?

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中说:“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墨子完全是反革命派”;墨学研究者方授楚、党晴梵等则认为“墨子是具有叛逆的特点”。看法如此相反,究竟谁比较科学呢?

郭沫若说:墨子“十篇东西整个在替‘王公大人’说话,开腔一声‘王公大人’,闭腔一声‘王公大人’。我曾替他统计一下,他所喊的‘王公大人’的次数一共有六十七次”。事实上,墨子所说的“王公大人”,有的是骂他们,有的是劝他们,哪里是“整个在替‘王公大人’说话”呢?郭沫若又说:“这‘士君子’又每每与‘王公大人’连文而为‘王公大人士君子’,就是当时的官僚或统治阶级的意思。据此,你可以知道墨子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阶层的。”按“士君子”与“王公大人”,都是墨子骂他或劝他的。人们都知道“君子”是孔子自居

或称赞的,与“君子”相反的“小人”和“贱人”、“役夫”等是墨子自称或被骂的,此点是不难弄清楚的。

郭沫若又说:“墨子的非攻,简直可以说是无条件的投降主义……正是鼓励强暴者的攻伐。”按墨子的非攻,是反侵略而重守卫,也不是反战,他要诛不义。故应全面看问题,不能夸大到反面去。

郭沫若把墨子主张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贬到比做“近时的纳粹法西斯者流,不是同样有这种精神么”?这真是“拟不于伦”!

郭沫若是一个学术贡献很大的历史人物,为人们所敬佩;但对于孔墨比较的问题,是否偏见太多了呢?是否把历史小说化、创作化了呢?

六、杜国庠论墨子思想及其逻辑

杜国庠(1889—1961年),中国思想史家、《墨经》逻辑家。广东澄海人。字守素。笔名林伯修。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1919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教师,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主编、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广州分院院长等职。早年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著作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便桥集》等。曾参加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述工作。逝世后,结集《杜国庠文集》,内有关于墨家部分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墨经的“存”不同于公孙龙子的“藏”》、《墨经的时空观》、《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墨家的逻辑也没有和认识论分家》等。

杜国庠对于墨家研究有素,但多属于《墨经》中的逻辑方面,他是尊墨的,曾被人称为“墨者杜老”。他与反墨的郭沫若有时“争论

得相当厉害”。(郭沫若《序杜国庠文集》语)

中国近现代研究墨学者多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缺少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同时,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又不大研究校勘、训诂、考据。所以对于《墨经》部分研究不深,《墨经》部分至今仍存在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古书中最易弄错、最难读的也是《墨子》的《墨经》部分。因此,研究墨子的专家,大约可分为三种人:一是只研究墨子的思想,或包括其逻辑学但不研究墨子的科技部分。二是研究墨子的思想而兼科技部分,却难尽通。三是偏重研究墨子的逻辑学而不研究其科技部分,杜国庠也是其中的一个。

杜国庠与郭沫若两人论述处处对立。试举数例:郭沫若斥责墨子是“整个在替‘王公大人’与‘士君子’说话”;杜国庠却称赞墨子是贱人役夫,“多半还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合于‘王公大人’‘士君子’的胃口”。郭沫若斥责墨子的非乐;杜国庠却看出当时的人民正在“救死惟恐不赡(孟子语)”的时候,故墨子之所非,并不是无的放矢。郭沫若说“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是一位绝好的教祖,和耶稣、穆罕默德比较起来,实在是毫无愧色”;杜国庠却能看出“规矩是人造出来的,墨子的所谓天志也是他创的”。郭沫若说墨子“我真不知道他何以竟能成为工农革命代表?”杜国庠却说:“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是革命的。”“他接近‘农与工肆之人’,也代表着他们的利益。”郭沫若说墨子“极端保守”;杜国庠却引《淮南子·要略》有关的话“揭露了(墨子)‘不与先王同’的秘密,指出儒墨对立的关键”。

杜国庠对墨家的逻辑(论理学),有特别的研究,他指出墨子“有两件非常突出的重要发见,就是‘类’和‘故’的发见。这种发见,在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上,墨子要算第一人”。又说:“墨家的逻辑思想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第一、墨家逻辑的提法是先‘自悟’而后‘悟他’的。第二、墨家逻辑反映了墨家重实践、贵功用的

精神。”这些都說得很精彩！

杜国庠认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仁”字，墨子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义”字，这个看法同于清朝末叶夏曾佑所说：“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杜国庠根据的只是《贵义》篇；事实上，从《墨子》全书看，墨子往往“仁义”联言而不分，如《兼爱下》说“兼即仁矣义矣”，认为仁义就是兼爱，兼爱就是仁义。有时单言仁，有时单言义。同一篇《非攻上》，不仅同样说“不义”、“不仁”、“不仁义”，而且“不仁”、“不义”互用，等于相通。同一篇《天志下》，也同样说“不仁义”、“不仁”、“不义”。……即在《贵义》篇说的“必为圣人”，也是“仁义”与“义”不分的。无论联言与单言，仁与义，主要都是与兼爱、交利有关系的。认真地说，应是孔墨二人表面上均常言“仁”，而“仁”的内容却大不同。孔子的仁是以“礼”为主与以“孝”为先的，“礼”与“孝”都是有差别的，故孔子的仁者爱人，被墨子称为别士的爱人。墨子却反而主张仁人兼爱而无亲疏之别，故称为“兼士”“兼君”（或“兼王”），他是反“礼”的，反差别的。

但杜国庠也否定孔子的“仁”。他曾说：“孔子说：‘齐之以礼’。……礼重差别，以不齐为齐……在这种差别的礼的观念之下，仁是没有方法贯彻的。所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这种敬，恐怕只是畏敬，不是爱敬吧！那就离开了无条件的‘爱人’。”（以上引《杜国庠文集》）

七、严灵峰著《墨子简编》

严灵峰（1903— ），哲学家。福建连江人。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历任上海艺术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大学等教授。译著数十种，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各方面。著有《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老子章句新编》、《易学新论》等书。辑印《无求备斋诸子集成》，内分《老子》、《列子》、《庄子》、《孟子》、《论语》、《墨